

个人记忆与史学叙事的交汇

——以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料的微观补阙为例

黄文波

(广西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 在华侨农场归侨访谈实践中, 发现微观个体的口述内容有许多官方历史文本疏于记载的叙事, 或是与众不同的记忆。这些口述史料或许得不到证实, 甚至得不到传统史学界的认可; 或将尘封及消逝, 无法变现为官方史学叙事的文本。通过整理评估, 口述史料虽然出自微观个体, 但仍然具有可信度和史料价值, 经过悉心钩沉和充分考量, 可从其他角度进行记录和书写, 达到对大历史的拾遗补阙, 这个方案对于保留个人记忆乃至展示人类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口述史料; 个人记忆; 官方历史文本; 华侨农场史; 归侨

中图分类号: D6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513(2025)04-0032-06

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其分布呈现分散化和集中化的二元特征, 第一种特征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 可散见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及乡村地区; 第二种特征则主要由于历史原因而麇集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结构单元——华侨农、林场(以下统称华侨农场)及华侨企业当中。全国各地共有 84 个华侨农场, 先后保障了 60 万归侨侨眷及其他人员的生存和发展^[1]。数十年来, 随着中国华侨农场多轮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 华侨农场或转型为经济开发区, 或与乡镇合并, 陆续划入地方管理, 其存续或消亡似乎已进入关键阶段。“华侨农场”越来越可能从大众视野中消逝, 成为历史学叙事中的一个词汇。华侨农场当中的归侨作为历史见证者, 亲身参与建立、建设华侨农场, 自身也具有国外、国内双重生活经历, 随着微观个体的不断离去, 他们与当代历史交汇的许多独特经历与故事也将尘封及消逝。因此, 抢救性地收集与整理华侨农场归侨尚健在者的口述史料, 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

一、华侨农场史及归侨口述史的书写

华侨农场曾经作为一个实体单位, 其中的归侨

作为社会的一类特殊群体, 格外受到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关照, 同时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 相应地产出了不少有关华侨农场侨务政策与体制改革、归侨群体身份认同与文化适应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历史学视域下, 分为宏观历史和微观历史两种进路, 一种是基于华侨农场史的书写, 一种是基于归侨口述史的书写。

(一) 华侨农场史是当代中国史的组成部分

华侨农场史是当代中国史的一个侧面, 但其既显普通又略显特殊。普通之处在于其沿着当代中国史的主要脉络而附着发展, 经历了 70 多年的风雨历程; 而特殊之处在于, 其会随着华侨农场使命的结束, 如在国家针对华侨农场提出的“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大背景下, 最终走向消逝。过去, 华侨农场的官方资料出现于涉及安置的广东、福建、广西、云南、海南等省(自治区)的侨务志、年鉴当中, 书写鉴于史志之间, 具有一定的体例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 具有总结性质的华侨农场史的出现, 正成为一种重要的官方书写。

在中央层面,《中国华侨农场史》以史志图结合的方式, 广泛收集华侨农场的缘起及建立、社会

收稿日期: 2025-04-0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历史抢救性收集与整理”(批准号: 23AMZ013)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文波(1987—), 男, 广西柳州人, 博士, 副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史研究。

结构、体制变革、作用及贡献等各方面的宝贵资料，并将各省区个案进行研究，记载了全部华侨农场的发展历史。该书由中央职能部门牵头各地华侨农场共同参与，可谓一种官方的书写，征引的图片资料都经过精心筛选，亦是一种权威的表达。在地方层面，华侨农场本身具有丰富的档案史料，由此汇集而成的历史文本更多地代表区域或局部场域的官方书写，如《海南华侨农场》简要描述了海南省各个华侨农场的组建背景、沿革发展、特色产业、现状分析、改革创新、经验借鉴等，属于广义上的华侨农场历史文本。而《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简史》《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史》《博罗华侨农场史略》等则是华侨农场史书写中的具体个案呈现。

以上所列有关中国华侨农场史的成果^①，搭建了华侨农场从产生到发展再到变革及最后没落的主要时空脉络，其伴随着当代中国史的官方书写，是当代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但需要指出的是，华侨农场历史的终结只是体制的结束，而不是“人”本身的完结，人终将是生生不息的。也就是说，华侨农场史可以成为新的历史文本，华侨农场的人即归侨仍然是活态的，同样也可以产生新的叙事文本。那么华侨农场史，除了包括华侨农场的体制变革历程和大事记，也应当包括归侨个人生活历程。这两者并不冲突，而是相辅并进的，华侨农场的方方面面，正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人的形象构建起来的。如果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华侨农场史的文本书写已经相对充裕且方兴未艾，那么华侨农场内部的归侨口述是否还显重要呢？答案是肯定的。权威性的官方历史文本由于修史范围、史料取舍、体裁与准则^②等方面的约束，势必存在一些遗憾或缺漏，特别是在细节上，官方历史文本的呈现虽面面俱到，却不那么有血有肉具体生动。微观个体口述形成的史料则可以从另一角度对大历史或曰主流历史进行微观补阙。我们需要系统地了解华侨农场这个特殊场域的历史结构，更需要深入地探视场域里人群的生态历程。

（二）归侨口述史的兴起及趋势

近十余年来，已有不少机构及学者采用口述的方法对归侨进行史料收集和研究并产出成果^③。一方面，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主持的一项历时近十年的项目“归侨口述历史（2004—2012）”，收集整理并出版了天津、山西、广西、海南、广东、福建、浙江、河北、吉林、湖北、安徽共 11 个省、市、自治区的归侨口述录，走上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径。昆明市侨联对散居本市的归侨进行了爱国主题的访

谈，编著了《春城侨海情》，展示他们平凡且坎坷的人生。暨南大学则根据若干名本校归侨职工自述的人生经历，整理出版了《归侨口述史·暨南篇》，彰显他们的爱国报国之心。此外，一些学者利用归侨口述方法对社会学^④、档案学^⑤等学科研究做出了相应贡献。还有一批研究生以归侨为主题撰写学位论文，其中采用了口述的方法。但这些成果也存在一些缺憾，如在场域选择中没有深入到华侨农场，或是主题研究中没有进行系统性的口述史料收集。

另一方面，作为华侨农场内部的机构和个体，也运用归侨口述资料形成了一些文本，主要以独立创作或内部资料为主，如《寻找光明记忆》《拓星南荒》《暖心之处便是家》，以及《辉煌五十年：海南兴隆华侨农场》《海侨：海宴华侨农场 50 周年特刊》《岁月留痕：普宁华侨农场改革发展历程图册》《纪念成立大旺农场 60 周年华侨农场 40 周年特刊》等。这些资料文本具有较强的大众可读性，但较缺乏学术严谨性，因此当中的许多口述内容并不是主体文本，而是被当作辅助性资料，由读者自辨，此外它们的影响力和传播力都非常有限。

而真正意义上具备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特征的，主要有近年来学者通过系统性整理面世的一些成果，如《归国与再造侨乡》《归侨口述史·广西篇》《回归与融入》（福建卷）等，他们将研究场域和主体对象主要聚焦于华侨农场归侨身上，编著的核心思想是以科学化、技术性手段处理口述史料，以个人家族史、生命史补充和完善局部场域的微观历史。另外，也有一些文章借助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料构建了对归侨语言适应^⑥、侨居国认同^⑦的主题分析。这些基于归侨口述史料文本的出版，使得华侨农场相关研究在当前走向暗淡的背景下再度掀起波澜。

二、归侨口述史料的利用及对华侨农场史的作用

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由于其本身概念异常宏大，宇宙中的一切都可以囊括其中，因此人们无法将历史毫无保留地记录下来。那么在历史学的表达方式上，最主要的就是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的叙事，即口述和文本。华侨农场史的书写势必符合这个规律，既要通过文本、口述以及其他方面（如文物、遗迹）的不断建构，形成主干式的大历史，也要着眼于小地方、小事件、小人物，关注枝叶式的小历史。

其要旨在于保留场域历史的绝对真实性，同时也具有相对选择性，在一定时期内，或许存在一些不能撰述或隐晦的论点。因此，作为小历史的归侨口述史料，由于其来源比文本史料更具有主观性而缺乏权威性，因此并不具备颠覆华侨农场大历史的能力，只能作为后者的补阙。

(一) 归侨口述史料是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的有机统一

如果说华侨农场演进史的发展是大流量的江河，那么归侨个人生命史的发展则是小口径的涓流，汇集起来又助推了江河的奔腾。华侨农场史中涉及的既定人物和事件，是集体记忆作用的结果。因此，大历史中凸显的事件和人物，一定是具有较大影响力、较重要意义、较高地位的，同时是符合大众规范和客观事实的，故此才能深植入多数人的思维意识中，得到较为共同的认可和确立。

集体记忆是由个人记忆构成的，在不受外力因素干扰的前提下，集体记忆可以说又代表了大多数正确的个人记忆。在华侨农场历史中，归侨的记忆具有相似性和异质性，相似性表现在回国的路径、安置的情形、农场的生活、教育的程度、优待的政策、雷同的境遇等，主要涉及回国后的人生历程；异质性主要表现在其于侨居国时的原生家庭环境以及回国后的新生家庭生活，而最重要的，则是个人记忆中与众不同的闪亮点。个人记忆或许存在相当的局限和制约，抑或因为具体的心理、情感等因素可能会导致不一致，但其仍是文本史料的重要来源。日本学者竹内实谈道：“由于是讲话人凭记忆讲述，所以可能有记忆不确、想法不对的地方，这个不确、不对也是一种史料，这种失误也能折射历史，可能也是历史的影子。”^[7]因此，虽然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或龃龉，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又具有共同点，由于集体记忆形成的共识是官方历史文本书写的重要来源，因此个人记忆与历史叙事之间就存在交叉点。这就为归侨口述中没有被官方历史文本所采纳或忽视的个人史料提供了正名的理论依据。

在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的实践中，归侨口述者大多都是年龄较大的，而且讲述的是亲身经历或周遭发生的事件，这就存在口述者个人记忆模糊或夸大其词的情况。但是对于历史情节的模糊来说，因为很多是和个体自身相关联，可以借助集体记忆进行纠正；但是夸大历史情节的情况，从个人来说也存在一个限度，一般不会太天花乱坠，因为对于自

身没有切实益处，即使个人口述中存在夸大，比起官方历史文本书写中的刻意夸大，对主流的真实历史是没有影响力的。所以在基于个人记忆的口述史料中，这些容错率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允许的。

(二) 归侨口述史料可以成为分解后的中立文本

口述史学法及其形成的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存在一些概念上的差别，如左玉河认为口述史料不能等同于口述历史，“口述历史是研究者基于对受访者的访谈口述史料，并结合文献资料，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对其生平或某一相关事件进行研究，是对口述史料的加工、整理和提升，而不是访谈史料的复原。”^[8]虽然学者对相关概念有不同的定义，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历史是一门学科，口述是一种方法，个人是一种载体，史料是一种成果，史实是一种阐述。组合来说，就是在历史这门学科中，采用口述这种方法，对个人进行史料挖掘，以达到对过去事实进行揭示与定性的目的。

通过口述史料尤其是在口述者共同的集体记忆作用之下的印证与收集，能够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线索，有助于历史学方面的学术专论、教科书、科普及通识读物等文本的纂修。官方历史文本在史学叙事中早就形成了规范，因此其与历史小说这类具有虚构性加工、可以胡诌海谈的文本不同。比起集体共识，我们也应该关注到个人记忆中值得商榷或回味的地方。基于微观个体的口述，有其独特、可靠的成分，据此形成的史料是天然的，但如要成为官方历史文本的一部分，则必须要经过结构性、技术性拆分和语言文字包装，特别是基于历史学的传统方法，比对文献史料后进行择要安排。正如学者总结的，“口述历史提供的往往是一部分情节记忆，辅助于文献记录资料，有一定参考价值，并不能单独成为正确的历史根据。如果能找到当时的文字记录史料，一定不能先采用口述为证”^[9]。

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的去芜存菁、去伪存真的方法论，在大历史的基本图景下又勾画了历史线条，那么是否有必要进一步对历史精细化呢？笔者认为，精细化的微观视角对历史文本的书写是值得考量的，它有可能助长对大历史的进一步认知。这也可以说从口述和文本的关系来谈，口述对于文本的诞生或撰写、修复或补充都具有切实的意义。从前者来看，口述史料是文本从无到有的基础要素，从后者来看，口述史料则是文本从有到好的发展因子。官方历史文本的定式书写在走向饱和，发掘原始证

据进而改变文本，似乎是考古学或古生物学的职责范畴。历史学的文本不会轻易改观，因为在知识堆叠和技术手段下，原始史料愈发互证既有研究的准确性。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活态的个人口述，将其变成补充或解读官方历史文本的重要来源。随着口述在社会研究中愈发重要，其在复原历史方面具有文本无法替代的价值，文本是死的，口述是活的，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这就使得历史研究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了鲜活生动的民间。^[10]

尽管如此，口述史料同样存在弊端。就华侨农场史和归侨口述史比较，前者较为标准化，既成的得到广泛认可的历史事实不容推翻；后者则较为多样性，个体根据自身的记忆或者回避持有不同的说辞。前者具有规范性，按照既有的体例和结构进行搭建，后者则具有随意性，个体根据自身兴趣或者逻辑可能会天马行空。前者具有发散性，能够前后左右联结各种背景和元素，后者则具有片段性，囿于个人经历的时空限制。上述具备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特征的现有成果，还有一个重要的编著原则，即中立性，一是只记录不评论的小中立，然而这种客观记录也不能信手拈来，必须经过科学化、量化的提升，才能形成有效的文本；二是通过拆分辨析后形成的文本，必须要符合大历史的规范和逻辑，就是要保持其历史学纯粹性的大中立，不能够（也无法）推翻大历史，但也不可忽略细节，丢弃其特质；不能够走向浪漫的文学色彩，但也不可以千篇一律、寡淡无味。

三、归侨口述史料的微观补阙举隅

在认清传统历史文本与当前个人口述的面向之后，有利于我们利用口述史学法对华侨农场史进行研究，以期取得归侨口述史料对华侨农场史补阙的效果，特别是为当代史研究带来动力和源泉。基于此，以下试从收集到的归侨口述史料中整理出数例与众不同的个人记忆。

（一）解放战争中的安宁

在近现代，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时段的战争岁月。战争给人的感觉是残酷、混乱且消极的，这也是官方历史文本的叙事基调。如在解放战争中，以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大战役为代表，及全国各大战场陆续展开的激烈战斗，在历史书写中呈现的景象是炮火连天、轰轰烈烈，解放军气势如虹、国民党哀鸿遍野，社会治安不靖，似乎没有哪一个地方不

受到武装和思想上的波及。然而，归侨采访者 A 口述道：“我的家乡在大埔县梓里村，解放战争时候，海外的父亲送我回国内家乡上小学。那时候家乡的情况很安定，没有什么战争的感觉。因为有个重要的原因，我们那里出了一个范汉杰，他是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家里几个兄弟都是军长、旅长，他的一个哥哥就是我们县长，他家离我家就 100 米远。由于有这种势力，谁都怕他家三分，当地国民党部队和恶霸势力也就不敢招惹我们那里，共产党部队也不来，相反还不久去向范家要一些钱财，范家也会给他们钱，也不干涉共产党的事，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大家和平相处，我们也该玩玩该学学，没感觉到什么不同，一直到最后解放，就是县长跑了，整个乡没有放过一枪。”^[3]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对于全国性或全面战争的既有理解，由于人为的客观因素，战争之中还有安详的乐土。由是说，历史叙事在整体的共性当中是存在局部特性的，往往还具有很多特性，这种特性恐怕难以提炼，是需要从口述者的个人经历和体验中挖掘出来的。

（二）荷兰人解救华侨

华侨生活在他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多遭受不平等的政治待遇，间或受到统治当局、外来殖民者和本土民族主义者的多重压迫。归侨采访者 B 口述道：“1945 年日本战败之后，印尼人开始搞独立运动，但是荷兰人又回来了，想恢复之前的殖民统治，他们两边就有许多冲突，我们华侨就夹在中间。有些印尼人很坏，他们打着抗击荷兰人的旗号也杀害华侨。我死里逃生的一次，是印尼武装人员把我们这个村子的一两百华侨集中起来，准备要赶到河边去，其实我们知道到了那边之后可能要遇害。当时我还是小孩子，就和另一个人趁乱跑了出来，我们知道在村子不远的地方驻扎有荷兰人，就去找他们。他们收到我们的求救后，全副武装开了十几辆大卡车，冲到河边，打跑了那些印尼武装人员，解救了我们村子的全部华侨，并且暂时拉回驻扎地。但是之前印尼人已经在河边杀害了一批来自其他地方的华侨，鲜血都染红了河水，所以说排华他们早就有了。”^[4]关于这个说法，在学术讨论中，有研究印尼问题的学者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当时荷兰人自顾不暇，怎么可能去营救华侨，而且据其目之所及未见到相关的档案记录。但是二战后印尼乡下的华侨被印尼人驱赶戕害并得到荷兰人救援的这种历史情形（且不是在国外同一地点），在安置于别处华侨农场的另一位归侨采访者 C 口中也再次提

到,^⑤那么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个说法是作为亲历者的一个记忆深刻的事件。尽管被采访者当时都是孩子,但他们肯定能够分得清欧洲人和印尼人、华侨华人的基本长相,以及意识到他们相互采取行动的善与恶本质。在有关的史学叙事中,不否认印尼暴徒发起对华侨华人的攻击和侵犯,制造多起排华惨案。然而这里的实质争议点,并非印尼是否排华,而是荷兰人有没有参与解救华侨,这点在官方历史文本中并没有客观的书写,呈现扑朔迷离,而通过口述者处获取的这一细节,似有弥补官方历史文本缺憾的必要。

(三) 越南逃兵成中国公民

20世纪70年代末被越南当局排斥的华侨,本身在法理上就是保持着中国国籍的公民,他们由于不愿意加入越南国籍而遭到不平等的对待。在回到中国后,他们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接待和安置,乃至联合国难民署的关怀。归侨采访者D口述道:“我们从越南老街过云南河口的时候,越南这边是不阻拦的,中国那边是欢迎的。中国边防人员和侨务干部也不检查什么证件,因为我们很多人跑得匆忙也没有证件,就是简单询问登记一下信息。我记得同行的队伍里面就混有一些单身的越南士兵,他们是害怕被送到前线去跟中国军队打仗而脱掉军装丢掉武器跟着我们一起跑的,成为了逃兵。他们后来也跟我们一样得到了登记和安置,所以我们这边就有京族,很多都是这些逃兵。”^⑥关于京族的存在和来源,普遍认为其主要聚居在广西的巫头、万尾、山心三岛,主要是由于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划界所形成的既成历史。对于云南的分布情况虽然有人口普查,但官方并没有过多地去深究当地京族的历史。这里既涉及明面与暗里的人物表述,如他们宣称为华侨而实质上并不是;也关乎宽容与严格的书写尺度,如经过中国政府的认定即具有我方法定的效力,在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官方历史文本只能避而不谈。但事实上历史的真相或许就存在于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中。

(四) 梁锦记铁铺与孙中山

孙中山曾言,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源自其在美国、日本、南洋等地筹措革命经费、推动革命事业过程中得到了华侨的大力支援。为推翻清王朝,孙中山先后5次到过越南,建立了以河内、海防等地为中心的海外革命基地,结识了一大批的海外志士。归侨采访者E口述道:“我爷爷在海防开了一家梁锦记打铁铺,在当地是很出名

的,你去问人家都知道的。孙中山在海防干革命的时候,我爷爷还和他是好朋友,经常有来往的。后来民国建立了,我爷爷还去过北京,但我爷爷不是革命党。”^⑦孙中山作为时代的伟大人物,其在海防华人社会中的活动,是有许多史料支撑的,但史料的重点突出之处仍然是具有意义的事件与人物。关于孙中山与一间普通打铁铺的关系,如果没有特殊的事件或人物关联,可能在其人生经历中是微不足道的,难以受到关注和得到记录。在口述者看来,其家族的打铁铺是很出名的,但是事实上又不是那么出名,这反映了一种场意识的偏袒,因所在空间及所涉人物具备与其本人直接关联的主体性、主观性及重要性,使得其认为“应当”出名。而作为他者及研究者的我们,无法从非常微观的角度和如此具体的细节直接得出“出名”这种推论。但是孙中山作为万众敬仰的伟人能够与其家族建立联系,确实是其无上荣光的谈论资本。

(五) 华侨并非全是汉族

归侨回到中国后,部分优秀归侨得到国家的培养,经过自身不断努力,成长为华侨农场等企事业单位及政府机关的领导,但仍有多人从事与侨务相关的工作。归侨采访者F口述道:“我当时任农场侨务科科长。有一次省侨办领导安排我们去文山那边接侨。我们开车赶到那边,已经有许多人在热烈欢迎归侨了,我一看有穿着各种各样少数民族服装的人,就问归侨在哪里,侨办领导就说,这些就是归侨啊。我才知道,归侨并不一定都是汉族的,还有很多少数民族的。”^⑧在全国各个华侨农场中,都或多或少有少数民族归侨的存在,但云南省是少数民族成分最多的,并且他们较显著地呈现出自身的文化特质,譬如语言、服饰、传统习俗、生活用具等。这些少数民族归侨的接待安置政策跟所有归侨一致,表明中国政府在人权、公民权等方面始终做到了平等对待。历史书写中需要指出的是,华侨并不仅仅狭义上指代汉族侨民,李安山就强调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对侨居国和原居国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存在差异。^[1]在当时的情况下,中越边境受难族群选择原居国的认同,可以被认为是华侨。这里讲原居国而不是祖籍国,是因为许多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并没有国籍证明(事实上许多汉族华侨也没有),依靠自身的叙述,以及对中国的归附和认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和确定的。在历史书写中,有效地处理好汉族华侨与少数民族华侨的区别与联

系，是非常重要的，作为对当前民族意识形态宣传的注脚，也具有现实意义。

四、结语

在当前，官方历史文本是史学叙事最重要的载体，也是文史资讯变现的主流形态；个人记忆虽然包含有史学叙事的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交汇存在广度、信度等方面的主客观评判及考量。以上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料案例举隅，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是我们首先要回应一个问题，这些归侨个体的口述史料能否反映真实、宏大的史学叙事，能够作为一种微观补阙交汇到既有的官方历史文本当中？归侨的案例有些是个人记忆的孤言，又或许不是孤言，但见证人已经斯人远去或难觅其踪；有些是集体记忆可证实的情形，而没有被选择录入官方历史文本中，抑或是史料收集者和编纂者认为其是微不足道的插曲。从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的实践来说，笔者认为大多数在既有历史资料无法明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相信或者有选择的相信，因为“那些可兹证明的历史事实与虽未确证但亲历者牢记（或遗忘）的主观叙事，都是完整的历史学研究的应有疆域。”^[12]每个人的回忆中都会着重于一些与他者不同的亮点，而在经历了半个世纪之后，他们能够记忆犹新，愿意倾心讲述，并不是为了何种利益，更没有受到什么无形的压力。这些归侨具有自己朴实的心路历程，是值得史料采掘和历史书写的重要人力资源。我们应该打破书斋学者高高在上的姿态，既不能仅持历史文本论，历史文本已经是史料加工的产品，如果说书上无载则为虚，那么将陷入本末倒置或者孟子所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境地；也不能单凭官方史料论，史料再汗牛充栋，也不可能涵盖时空当中的上下前后芸芸众生。华侨农场归侨口述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对于华侨农场史乃至当代中国史具有一定的启示：尽管某些口述史料来源是单一的，不能或无法注入大历史，但仍然具有可信度和史料价值，可以在悉心钩沉和充分考量之后，从其他角度或以非官方历史文本的形式进行记录和书写，达到对大历史的拾遗补阙，这个方案对于保留个人记忆乃至人类的记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既有官方历史文本的前提下，如何记录、书写以达到补阙的效果，这或许是一个文体的问题，或者说是理解的角度不同，当然有关的方法论也是当代中国口述史研究中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注释：

- ① 参见：董中原：《中国华侨农场史》（主卷）（广东卷）（福建卷）（广西卷）（云南海南江西吉林卷）（政策法规卷·地方文献资料卷）（图片资料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朱华友：《海南华侨农场》，海南出版社，2008 年；陈宇锋：《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简史》，足印出版社，2010 年；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厦门天马华侨农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 年；邹雄彬：《博罗华侨农场史略》，中国华侨出版社，2024 年；等。
- ② 参见：林晓东，张秀明：《回首依旧赤子情》，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年；林晓东：《风雨人生报国路》，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年；林晓东：《蹈海赴国丹心志》，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 年；林明江，林晓东：《椰风蕉雨话侨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林明江：《岭南侨彦报国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林明江：《八闽侨心系故园》，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 年；林明江：《钱江侨杰数风流》，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 年；林明江：《燕赵赤子绘宏图》，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 年；林明江：《报效祖国献青春》，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年；林明江：《荆山楚水系侨心》，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年；赵红英，康晓萍：《徽风皖韵聚侨心》，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年；牛军凯，袁丁：《归国与再造侨乡》，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朱燕：《春城侨海情》，中国华侨出版社，2016 年；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归侨口述史·暨南篇》，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 年；陈瑛：《寻找光明记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9 年；夏鲁平，李俊，梁森奎：《拓垦南荒》，中国华侨出版社，2021 年；梁茂春，陈文：《归侨口述史·广西篇》，暨南大学出版社，2022 年；郑一省：《回归与融入》（福建卷），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23 年；塞北雄鹰：《暖心之处便是家》，中国华侨出版社，2024 年；等。
- ③ 2023 年 11 月 29 日在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对马来西亚归侨 A 的访谈。
- ④ 2023 年 7 月 19 日在广东陆丰华侨农场对印尼归侨 B 的访谈。
- ⑤ 2024 年 11 月 22 日在海南彬村山华侨农场对印尼归侨 C 的访谈。
- ⑥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云南甘庄华侨农场对越南归侨 D 的访谈。
- ⑦ 2024 年 4 月 24 日在云南红河华侨农场对越南归侨 E 的访谈。
- ⑧ 2024 年 4 月 17 日在云南甘庄华侨农场对越南归侨 F 的访谈。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王晓萍. 新中国侨务政

[下转第 42 页]

- [3] 白乐.“全球南方”在现代化叙事中日益凸显[N/OL].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10-21 [2025-09-20].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410/t20241021_5795755.shtml.
- [4]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旧方式已经不复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战争变得更具毁灭性[EB/OL]. (2017-07-04) [2025-09-20].<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the-old-ways-are-gone-papua-new-guinea-tribal-wars-become-more-destructive>.
- [5] 张孝芳. 马来西亚国家元首制度: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J]. 东南亚研究,2018(2):76-93.
- [6] CAMPBELL I C. Island Kingdom: Tonga Ancient and Modern[M]. Auckland: Canterbury University Press, 1992.
- [7] CRANE E.A. The Geography of Tonga: A Study of Environment, People and Change[M]. Auckland: Wendy Crane Publisher, 1979: 48-53.
- [8] TONGA GOVERNMENT. The law of the government of Tonga[M]. Auckland: The Brett Printing Company, 1907:189-208.
- [9] VAN DER GRIJP P. THE MAKING OF A MODERN CHIEFDOM STATE: THE CASE OF TONGA[J].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993, 149(4): 661-672.
- [10] CAMPBELL I C. Aid and Dependency: The Example of Tonga[J]. Pacific Studies, 1992, 15(7): 66-68.
- [11] TONGA STATISTICS DEPARTMENT. Population Statistics Tonga Statistics Department[EB/OL].[2025-09-20].<https://tongastats.gov.to/statistics/population-statistics/>.
- [12] MOALA K. Island Kingdom Strikes Back: The Story of an Independent Island Newspaper, Taimi ‘o Tonga[M]. Auckland: Pac Media, 2002.
- [13] CAMPBELL I C. Tonga: The Constitution, the Riot, the Election and Reform[J].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8, 33(5): 2-6.
- [14] BENGUIGUI G. Tonga in Turmoil[J]. The Journal of the Polynesian Society, 2011, 120(4): 349 - 367.
- [15] HARMAN H. “Tongan riots, 2006” [EB/OL]. libcom.org, (2008-06-28)[2025-09-20].<https://libcom.org/history/tongan-riots-2006>.
- [16] Tonga remains in debt caused by 2006 Nuku’ alofa riot [EB/OL].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2025-04-20)[2025-09-20].<https://www.abc.net.au/pacific/programs/pacificbeat/pacific-beat/105179958>.
- [17]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20-40.
- [18] LATU S.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 in the Kingdom of Tonga: Democracy and Democratisation[M]// 陈德正, 王作成. 太平洋岛国研究:第二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3-46.
- [19] CAMPBELL I C. Progress and populism in Tonga politics[J]. The Journal of Pacific History, 2006, 41(1): 49-60.
- [20] AFRICACERT. About AfricaCERT[EB/OL].[2025-09-20].<https://portal.africacert.org/about/>.

[责任编辑 李夕菲]

[上接第 37 页]

- 策六十年回顾与探析[Z].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2010:193.
- [2] 商惠民. 古代中国官修史书的流弊[J]. 探索与争鸣, 1995 (9):42-44.
- [3] 刘朝晖. 社会记忆与认同建构:松坪归侨社会地域认同的实证剖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2):11-18.
- [4] 高晶晶. 数字记忆视域下华侨口述档案收集策略研究[J]. 兰台世界,2022(3):69-72.
- [5] 朱媞媞.“乡音”未改:归侨的语言适应与群体认同——以泉州双阳华侨农场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 (1):40-51.
- [6] 黄文波. 回归移民侨居国认同变迁研究——以广东 P 华侨农场为例[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4(3):58-66.

- [7] 竹内实. 小序[M]// 钟少华. 早年留日者谈日本.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1996:2.
- [8] 左玉河. 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J]. 中国图书评论,2006(5):4-10.
- [9] 严昌洪.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504.
- [10] 熊月之. 口述史的价值[J]. 史林,2000(3):1-7.
- [11] 李安山. 少数民族华侨华人:迁移特点、辨识标准及人数据统计[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3(3):1-18.
- [12] 周晓虹. 口述史与生命历程:记忆与建构[J]. 南京社会科学,2019(12):10-15.

[责任编辑 李夕菲]

The Confluence of Personal Memory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HUANG Wen-bo)

Abstract: In the practice of conducting interviews with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residing in farms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t has been observed that the oral accounts of individuals at the micro-level contain narratives often overlooked in official historical texts, or present distinctive memories. These oral history materials may remain unverified, or even unrecognized by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hey risk being forgotten or lost, never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textual narratives of official history. Through systematic collation and evalua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although originating from micro-level individuals,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possess credibility and historical value. Meticulous excavation and thorough consideration allow these accounts to be recorded and documented from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thereby achieving the supplementation and completion of the gr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his approach holds significance for preserving personal memories and even for showcasing the breadth of human history.

Key words: Oral history materials; Personal memory; Official historical texts; History of farms for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h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lemma in Global South Moder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e Tonga Riots (YANG Zhan-peng)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South countries have faced multipl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during their modernization processes, with political security issues arising from social contradictions be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e 2006 Tonga riots revealed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ublic's pursuit of Western-style democracy and a rigid political system. These tensions stemmed from a stability maintenance framework that combined traditional divine authority beliefs with a distinctive Westminster model, which, in the new era, led to power monopolies and unfair resource distribution. This incident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equit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and government, and South-South cooperation in preventing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offering governance insights for Global South nations.

Key words: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Global South; Moderniza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Proliferation of Specialized Collections of Odes to Plum Blossoms in Ancient China

(ZHENG Bin)

Abstract: Specialized collections of Plum Blossom poetry emerged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after accumulating through the Southern So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reached their zenith in the Qing Dynasty. Their development was consistently rooted in the increasingly flourishing culture surrounding the plum blossom. As a major branch of object-chanting literature, the thre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of expressing emotions and aspirations, documenting natural wonders, and elucidating principles served as key drivers for the cre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se specialized collections. Additionally, the refined literati practices of "collaborative composition on the same theme" and contests of skill among poets provided the subjective impetus for their prosperity. Furthermore,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and popularity of woodblock printing after the Song Dynasty offered the objective foundation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se poetry collections.

Key words: Plum Blossom poetry; Plum blossom culture; Object-chanting poetry; Creative psychology; Printing technology

On the Diasporic Aesthetics and Spiritual Homecoming in *Gui Chao (Returning with the Tide)*

(WU Li-li)

Abstract: Chen Chongzheng's *Returning with the Tide* depicts the life journeys of Chaozhou people across generations—their diasporic experiences of "sojourning abroad" and their eventual return to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Driven by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push factors and external pull factors rooted in natural and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 they left their hometowns to embark on survival expeditions. In Siam (present-day Thailand), the Chaozhou community actively promoted the localization of their native culture, constructing a spiritual homeland through transplantation and replication within a foreign cultural context. This process facilitated integration and coexistence with the indigenous culture of their host society, enabling them to take root in a foreign land. Moreover, the cultural gen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civilization and maritime traditions embedded in their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fostered a deep sense of cultural rootedness among the overseas Chaozhou community, demonstrating an ethical awakening to national righteousness under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Chen Chongzheng; *Gui Chao (Returning with the Tide)*; Diaspora; Homecoming

On the Postcolonial Discourse Narrative in *No Longer at Ease*

(XIAO Na)

Abstract: In *No Longer at Ease*, Chinua Achebe employs a postcolonial narrative to focus on the loss of indigenou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revealing how colonialism dismantles traditional African tribal values through material temptation, educational discipline, and spatial segregation, reducing them to a "Western-indigenous" hybrid system. The protagonist, Obi, as a "cultural hybrid", is trapped in identity anxiety, rejected by whites and crushed by the decaying notions of his native tribe. Through the interweaving of individual fate and collective experiences in a postcolonial society, the novel expresses the expectation of facing the chronic ills of native society, healing colonial trauma, and rebuilding indigenous cultural identity, offering profound reflection and inspiration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Key words: *No Longer at Ease*; colonialism; Postcolonialism; History; Space; Culture; Subjects

A Cross-Le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FAN Jian-feng)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aims to address the fragmented nature of current studies in this field. Existing literature lacks 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 the cross-level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multiple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levant research findings and innovatively proposes a "Context-System-Behavior-Outcome" (CSBO framework) cross-level research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not only constructs a systematic analytical blueprint for studying the legitimac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but also, through its cross-leve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nd forward-looking application design,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o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legitimacy.

Key words: CSBO framework; Institutional logics;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Legitimacy